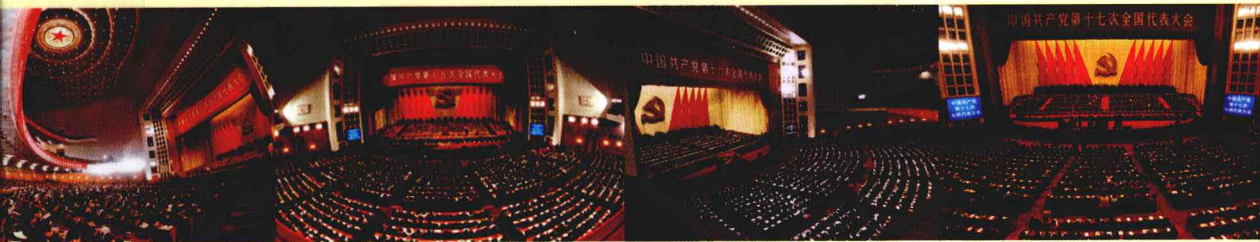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史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十八大

上册

本书编写组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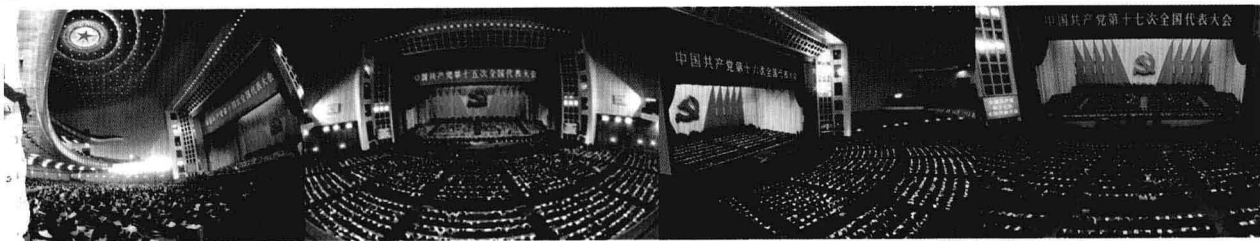
新华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史

上册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十八大

编写组 编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史：全2册 /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史》编写组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166-0152-5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料 IV. ①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53388号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史 (上下册)

编 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人：张百新

选题策划：刘志宏

责任编辑：刘志宏 沈文娟

责任印制：廖成华

封面设计：伍民力 蔡 恒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李尘工作室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42.5 18页彩插

字 数：649千字

版 次：2013年2月第一版

印 次：2013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152-5

定 价：1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总目录

上册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一大 1
- 第二章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二大 55
- 第三章 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中共三大 89
- 第四章 革命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中共四大 ... 131
- 第五章 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中共五大 157
- 第六章 大革命失败后的抉择——中共六大 203
- 第七章 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中共七大 245
- 第八章 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中共八大 301

下册

- 第九章 究竟让什么人接班——中共九大 339



第十章	左倾错误的延续——中共十大	367
第十一章	建设现代化强国与坚持“继续革命” ——中共十一大	399
第十二章	全面开创新局面——中共十二大	425
第十三章	绘制改革的蓝图——中共十三大	461
第十四章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中共十四大	493
第十五章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中共十五大	535
第十六章	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中共十六大	573
第十七章	推动科学发展——中共十七大	603
第十八章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共十八大	631



上册
目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一大

- 一、“南陈”和“北李” 2
- 二、来自远方的关注 11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革命实践 20
- 四、悄然筹备中的会议 31
- 五、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40

第二章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二大

- 一、民主革命任务的理论探索 56
- 二、民主革命思想的酝酿 63
- 三、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 69
- 四、二大的历史意义 82



第三章 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中共三大

- 一、党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 90
- 二、西子湖畔的争论 94
- 三、迟到的“五月指示” 102
- 四、简陋环境定大计 106
- 五、国共合作的实现 121

第四章 革命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中共四大

- 一、合作中的国共两党关系 132
- 二、上海横滨路6号的决策 140
- 三、关于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 149
- 四、党对民主革命理论认识的深化 153

第五章 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中共五大

- 一、三次让步的代价 158
- 二、危机四伏 172
- 三、紧急关头的彷徨与软弱 181
- 四、直面假左派的真面目 187
- 五、合局破败再燃星火 197



第六章 大革命失败后的抉择——中共六大

- 一、“八七”会议后的初步准备 204
- 二、莫斯科郊外的酝酿 214
- 三、充分讨论的各项议程 222
- 四、制定了一条基本正确的路线 236

第七章 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中共七大

- 一、要召开一个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大会 246
- 二、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盛况 252
- 三、四个意义深远的主题报告 260
- 四、成熟的中央集体的形成 287
- 五、准备应对“十七种困难” 294
- 六、七大的历史功绩 299

第八章 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中共八大

- 一、“我们要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302
- 二、一切都按高要求精心地准备 306
- 三、形成中的新的领导集体 314
- 四、八大各项决策在一派民主气氛中产生 322
- 五、影响深远的八大 331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一大

- 一、“南陈”和“北李”
- 二、来自远方的关注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革命实践
- 四、悄然筹备中的会议
- 五、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一、“南陈”和“北李”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能不谈到两个关键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即“南陈北李”。

1936年毛泽东在与探访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①

毛泽东讲这话的时候，李大钊早已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陈独秀则正被蒋介石关在南京监狱中。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充分肯定了“南陈北李”在建党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独秀，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8日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李大钊，幼年的学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

陈、李两人，相差十岁，性格很不一致。李大钊身材高大，态度温和，平顶头，椭圆脸，八字浓密的胡须，像漆一般黑。陈独秀中等身材，态度严峻，词锋犀利，像一股烈火似的。1915年，袁世凯大搞帝制的复辟活动，与日本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陈独秀这时刚从日本归国，他以极大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2—133页。



的爱国热忱和革命勇气，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

那时李大钊尚在日本留学，闻听袁世凯的卖国罪行，留日学生纷纷集会，李大钊受留日学生总会的推举，愤怒地执笔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1916年1月底，为联系反袁事，李大钊离日回国。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蔡到校不久，为物色各科人选，经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陈独秀到北大后，《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

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开始和陈独秀在一起共事。8月，沙滩红楼新校址建成，图书馆于10月间从原来的马神庙搬到那里。为了让北大师生能够不间断地借到书，李大钊决定“每日上午闭馆，下午及晚上仍在旧舍开馆”，并且大量增购中外图书，尤其是那些宣传和介绍新思想的书籍，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了传播新文化的园地。

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还创办了另一个著名刊物《每周评论》，进一步点燃了新文化的烈火。

陈、李两人，交谊很深。李大钊对陈独秀很尊重，总是称他为仲甫先生，不叫他的名字。他常对人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走出书斋走上街头，积极投身群众的革命运动。

但是刚刚走出书斋的陈独秀就遭遇了人生第一次被捕的经历。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军警狂捕游行学生，尽管经过多方努力，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但是，6月3日和4日，又有近千名学生被捕。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罢工，商人开始罢市，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五四运动的两大旗手——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定把斗争引向深入。

6月9日，他们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取消步军统领衙门和京畿卫戍司令部两个机关，保障市民集会、言论自由等“最后最低之要求”，要对北京政权予以“根本之改造”。

《宣言》起草完后，陈独秀把它交给了老乡胡适，由胡适译成了英文。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建议把《宣言》送到北大平时印讲义的蒿祝寺旁小印刷



所印刷。当晚陈独秀与高一涵前往该处，印刷所内的两位工人警惕性也很高，事毕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传单印完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

陈独秀想试探一下市民对《宣言》的反应，于是他和友人首先来到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时值暑假，市民多在午后去中央公园转转，吃茶的，乘凉的，会友的，十分热闹。陈独秀友人将一张张传单放在公园没有人的桌上，用茶杯压好，然后在一旁悄悄等待。等到吃茶的人回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他们就在远处偷着高兴。

传单在中山公园受到的欢迎，使陈独秀在更大范围进行宣传的信心更足了。永安路北侧香厂路的新世界游艺场，成了下一个散发传单的目标。

6月11日，下午七点，陈独秀受友人之邀，来到新世界附近一个名叫浣花春的四川饭馆聚餐，他随身带上了千余份传单。晚餐后，约八点多，陈独秀西装革履，头戴白帽，立即前往新世界游艺场。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潜入了第五层的屋顶花园，那里既无游人，也无电灯。时间已近十点，恰好四层的楼台正放露天电影，趁此良机，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凭空一挥，大把的传单如雪片般飘向人群，人群一片骚动……

陈独秀没有料到，此刻危险正向他逼近，新世界早已布满了密探。几天前，外右五区警察署查获了一张传单，说将在新世界安置炸弹，于是警察署立即加派了区警署侦缉队的便衣侦探，每天晚间分布在各楼严密侦查。此外，步军统领衙门也安排了密探严加防范。弹丸之地的新世界，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进入新世界后，“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因上下楼频繁，而且衣服兜中显现膨满之物，引起了侦缉队两名便衣侦探和步军统领衙门一名密探的注意和跟踪。当陈独秀在五楼屋顶花园准备再次抛撒传单时，一伙埋藏在暗处的探员立即涌出，把陈独秀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传单一卷和信函一封。因新世界处于闹事繁华地带，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一名侦探脱下灰色大褂将陈独秀罩住，秘密押往外右五区警察署。

当晚十二点，数百军警立即前往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住宅，从陈独秀家中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一共数百张，以及杂志、稿件、信札数十件。



当押送陈独秀至中途时，步军统领衙门密探与警察署探员发生了争执，他们都想将陈独秀送往自己的部门进行处理，由于当时区警察署的便衣人数比步军统领衙门的密探多，陈独秀才被送至警署解至警察厅。后来，步军统领王怀庆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发生争执，王怀庆想以治安妨害绳以军法，吴炳湘想以违反警律处置，争执到徐世昌大总统那儿，徐总统以送法庭判决结束争执。王怀庆是何许人也，他是陈独秀《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官职并驱逐出京的6人之一，对陈独秀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主张“非严办不可”，而与之相比，吴炳湘是安徽同乡，态度也较为缓和。幸亏吴炳湘的坚持不让，否则陈独秀若落入王怀庆之手，生还希望必定十分渺茫。

在“五四”这个敏感时刻，陈独秀的被捕，立刻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各大报刊、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政界人士强烈谴责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汹涌的营救浪潮席卷而来。

6月13日，北京《晨报》等率先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学界和教育界立刻行动起来了。

15日，在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等人的艰苦努力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率先致函京师警察厅，提出两点意见：其一，陈独秀在全国学界享有盛望，他从不隐瞒个人的言论思想，国内外都知道，这次以嫌疑加罪，会再次激起全国学界波澜，而在此学潮激荡的时刻，还是大事化为了好；其二，陈独秀向来以提倡新文学新思潮而被一般守旧学者嫉恨，此次忽被逮捕，国内外人士都会怀疑是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

16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联名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等知名教授40人，致函警察总监，指出，查陈独秀此次行动，如果真如报纸所载，可能不免有越轨之嫌，但是他的本来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的愿望。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本着维持地方秩序，息事宁人的态度，对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宽爱之心。

共同起草《宣言》的李大钊，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学生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四处传播，通过制造社会舆论压力营救陈独秀。23日，北大学生黄昆仑致信全国学联，请求声援。



陈独秀的同乡士人也纷纷登上了营救舞台。陈独秀是安徽人，北京、上海等地的同乡故友，在皖的各界名流，纷纷奔走游说。6月19日，余裴山致函安徽协会。25日，安徽同乡会吴传绮等8人联名致函警察总监吴炳湘，要求释放陈独秀。

26日，胡适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

陈独秀先生被捕事警厅始终严守秘密，不把真相发表也不宣布真态度，到前日始许一人往见独秀。他现染时症发寒，他的朋友听见了很着急，现在有许多人想联名保他出来养病，不知能办得到否？

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陈独秀被捕后也很着急。在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他郑重地提出了陈独秀在北京被捕之事。他对许世英说：“你们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又说：“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听说，口口声声地表示：“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游说力量还闯入了总统府。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严范孙先生的儿子严智怡带着父亲的手书找到私交深厚的徐世昌大总统，徐世昌开始以“这是司法部的事”推托。严智怡说：“陈独秀生平的言论思想是一件事，陈独秀因嫌疑传单被拘又是一件事，不能拿他平日的言行来裁判他……大学为新思想发源地，无论什么思想都要拿来研究的……怎能够去干涉他呢？借新旧思想暗潮来兴‘文字狱’，实在于教育前途有碍。”徐世昌听了，“颇动容”，应允“维持”。

严智怡出总统府后，又趁热打铁游说司法总长朱深，朱深推辞说：此案“现在尚没有交到司法界，所以不能过问”。经过严君再三说明“文字狱”的厉害，最后，朱深也答应“维持”。

除此之外，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也都致电当局，要求宽大处理陈独秀。

当年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呼吁释放陈独秀的行列。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署名“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

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



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社会各界的声援和营救，给北洋政府当局造成了巨大压力。

面对日益浩大的保陈声势，实际捕控陈独秀在手的吴炳湘想早日扔掉这个烫手的山芋了，同时诸多徽省同乡的人情脸面他也绝不能视而不见，虽然他遭受段芝贵、王怀庆等军阀派多方威胁，也受到守旧派暗中怂恿，但是对陈独秀并没有十分苛待。在被捕期间，陈独秀患上了胃病，由警察厅医药室医师进行诊治，经过十多天的坚持服药，胃病痊愈。

在各方声势浩大的营救浪潮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

查陈独秀以传单煽人为乱，殊属违法，既据联名列保称无别情，看押三月有余，查察尚知悛悔，姑念系属学子，拟从宽准予保释。惟其不知检束，殊有破坏社会道德，拟仍按豫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豫戒。

1919年9月17日，在监狱拘禁近百天的陈独秀，终于回家了。

按照豫戒法规定，出狱后陈独秀的行踪仍旧受到警察署的严密监视。由于陈独秀住所位于中一区，中一区警察署需按月填表呈报陈独秀的行为。一次，一名石姓警员，接到上级电话问询陈独秀是否在京时，因茫然不知而以“有失职责”给予“记大过一次”。

尽管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走出监狱无论如何也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大家都为陈独秀的释放而高兴和鼓舞。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同人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新诗，欢迎他的出狱。李大钊在《欢迎独秀出狱》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首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



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出狱后的陈独秀，重新开始集中精力编辑贻误多日的《新青年》，11月15日出版了六卷六号，12月1日又出版了七卷一号。

由于行动受到严格监视，陈独秀遂有迁居上海之意。

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筹办西南大学。陈独秀遂应负责筹办西南大学的汪精卫、章士钊之邀，秘密离京，于1月29日到达上海。在上海期间，他应武汉教会学校文华大学的邀请，于1920年2月2日乘“大通”轮离开上海，顺长江水路经南京西上，于2月4日下午冒雪抵达汉口，当天晚上留宿于文华大学。

与陈独秀一同抵达汉口的，还有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顾文华、刘大渠。北京学联代表赴汉口的任务，是“为京津沪联合同学齐集北京开国民自觉大会，促政府根本觉悟”。

在武汉期间，陈独秀连续发表演讲，畅谈社会改革、自治等问题，引起各界轰动。

2月7日下午，陈独秀与北京学生代表刘大渠等人乘车北上，于2月9日上午回到北京。

陈独秀在武汉期间，结识了文华大学青年工友郑凯卿和青年记者包惠僧，两个人稍后以“文华大学学生”的名义写作《武昌五局工人状况表》，在《新青年》八卷一号发表。以恽代英为代表的“利群书社”，也与陈独秀建立联系，陈独秀随后把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寄给恽代英翻译成中文，然后作为“新青年丛书”之一种由新青年社于1921年1月出版。

陈独秀是带着郁闷的心情回到北京的。按照《汉口新闻报》1920年2月9日的报道，武汉当局“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陈独秀也“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然而，刚刚回到北京的陈独秀，则再次遭遇险境。

原来，北京政府从报纸上看到陈独秀在武汉讲演的报道，才知道他离开了北京。京师警察厅头目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

胡适回忆说：



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道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还在家中。

独秀说，“我是在家中呀！”但是那位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您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独秀当然唯命是听，那位警察便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位警察一定会回来找麻烦的。所以他的请帖也就不写了，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陈独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他乃和李大钊一起离开了北京，从此便一去不复返了。

陈独秀这次离开北京颇有些传奇色彩。

那是1920年2月中旬，年关逼近，家家户户门前贴起了“迎春接福”、“万象更新”之类红色横幅。离正月初一——公历2月20日，眼看着只剩几天了。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30，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另一位坐在车篷之内，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约摸40岁。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风声甚紧，警察在追捕陈独秀……

骡车虽慢，但走的是小道，能躲过警察的眼睛。